

云南省京剧院重点创作剧目《团圆之后》——

叙述视角与主题焦点的双重挪移

方冠男

中状元以后，郑司成更是在皇恩浩荡的旌表之封前犹疑窘迫，及至私情被撞破，自尽的是叶氏，而他却只顾逃跑——这是他懦弱人格的具体表现；而颇具宿命感的是，这种人格表现同样显现在施佾生的身上，即便是他已为状元之身，在面对母亲羞愧自尽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同样是为了名誉而“掩盖”事实，但他的掩盖居然不是自己挺身而出、背负恶名，而是将妻子推到前头，为了母亲的名誉，而牺牲妻子的名誉，为了自己的家门荣辱，而牺牲妻子的家门荣辱。这本能的懦弱，与郑司成一脉相承。

两代人的悲剧，都显现为隐忍的女性化了懦弱的男性而承受了太多。在这部作品里，即便是男性的处境再被动、再尴尬，他们依然有几位女性为他们兜底受难，从这一点来看，剧中的女性角色，无疑是集中且典型的悲剧焦点，而最有戏剧性的是，女性越是承受苦难折磨越多，就越会为主流秩序所褒奖，那“贞洁垂范”的匾额和御赐诰命的荣耀，完全是一层镀金的枷锁，更为牢靠地锁住了封建时代女性的人格发展。从这一点看，剧中的女性不但承担了男性群体的掣肘，更耐受了整个社会制度性的规制。

因此，从人物处境的艰难程度和人格类型的典型性来看，女性，才是矛盾最为集中的焦点，“她”，才是绝对的主角；而从人物命运贯穿始终的连贯性来看，这个“她”，应该是柳氏。

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阶级压迫

柳氏是主角，这一判断既来自于人物命运的贯穿性，也来自于人物受难的彻底性。施佾生、郑司成、叶氏自然都是悲剧人物，但叶毕竟有了私情，无论如何心有不甘，他们背叛施家是事实，有此结果，便不能说完全无辜，而施佾生一开始选择了“隐瞒”，且不是自己主动承担罪责，也不能说完全无辜，而只有柳氏，是一个完全与前嫌无关的无辜者和局外人，却以一己之身承受了最为残酷的苦难。因此，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套完整且全方位的制度性压迫，而正是《团圆之后》这一剧指向最为尖锐、思想最为深刻的内蕴：阶级压迫。

这种阶级压迫的制度性内容是这样

体现的：第一层级，是柳氏身为女性所承受的宗族集团规范。所以，她必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每天起早，要向姑奶奶请安——这些三从四德的内使使得柳氏必须事事以夫为先，于是，当丈夫遭遇人生中的危机的时候，她必须挺身而出。而当夫家的利益与娘家的利益冲突时，她不惜让父亲被革除功名遭遇流放，也要维护夫家的利益。第二层级，是柳氏的丈夫施佾生所承受的官僚集团规范。他多年苦读终于高中状元，其实是接受了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原则的行为处世规范，从而得以进入官僚集团的体系当中，因此，他的行为必须受官僚体系的制约。一旦家庭丑闻败露，他的宗族和他个人的前程也必然为官僚集团所不容。第三层级，是官僚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皇权的制度规范。正如施佾生无法承受家庭丑闻所带来的前程崩坏代价，官僚集团也无法承受地方性丑闻所带来的整体性崩坏代价，因为在官僚集团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帝王赐予旌表的荣光，属于整个地方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而丑闻一旦暴露，则是对地方官僚集团政治命运的集体威胁，因此，面对着“欺君罔上”的集体嫌疑，他们也就必须要想尽办法维护地方荣誉。

于是，一条社会运行的制度性链条出现了：皇权规范官僚→官僚规范宗族→宗族规范家庭→家庭规范丈夫→丈夫规范妻子。自皇权而下，依靠庞大的官僚体系为工具、以传统宗族家庭为载体的这一套制度性压迫，终于就这样作用在了妻子——剧中的柳氏，身上了。它们呈现为这些元素：状元丈夫、三从四德、贞洁匾额。它们包围在柳氏身边，成为了萦绕在柳氏身边的一套完整且稳固的制度性压迫。当我们看清楚了这套制度性压迫的大宏状的时候，另一个事实也就清楚了，那就是：这套制度性压迫的实质并非所谓的“礼教”，而是阶级。

是的，本旨在于阶级的压迫，而非礼教的压迫。因为，礼教是封建时代阶级压迫的制度化载体——关键在于，在封建时代，女性无法进入官僚体系，因此，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地位。因此，她们只能攀附在以男性构成为主体的宗族、官僚、皇权体系之上，一旦体系的运行遇到阻滞，最先被牺牲和交易的，往往就是女性。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柳氏与私情无关却最终要付出最大的代价了。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礼教”会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渐趋淡化乃至消失，但阶级压迫却不休不止、永无止境。因此，从一开始，《团圆之后》就不全然是

一部仅仅控诉封建礼教的作品，它更应该指向对阶级压迫的控诉。我们必须要这么理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让这部作品保持生命的活力——毕竟，在中国已然进入独立自主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里，还去批判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被丢到历史垃圾堆里的“封建礼教”，有什么意义呢？

三、自挫锋刃的焦点挪移

上述文本的思考，其实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焦点挪移：

第一，云京版《团圆之后》，首先进行了一次主角焦点的挪移。原本，柳氏是绝对的主角，但在具体的移植过程中，出于“现实”的考量，将主角挪移到了施佾生身上，这种移植有没有意义呢？倒也不是没有。因这一人物的矛盾性，使得这一人物极富其丰富复杂，其表现的空间是丰富的；但是，一旦如此移植，就将主题也挪移了，原本基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社会压迫就被表面化地表现为了封建礼教的压迫——这就使得作品的深刻性被大大打了折扣。

于是，第二个焦点挪移也就出现了：阶级压迫被移植成为了礼教压迫，而礼教压迫中的焦点更是被简化成为了“情”的呐喊。可是，柳氏与施佾生之间能有什么“情”呢？两个封建社会中的宗族包办婚姻——并没有自由恋爱、主动结合的基础，又不是杜丽娘和柳梦梅，何来情之所至，又何来一往而深？如果说真的与“情”有关，叶氏和郑司成倒是一往而深的，他们结合并无过错，但结合以后，珠胎暗结却谎称八月生子，不但让施佾生以施家公子的身份坐拥施家的一切资源和资产，甚至还让生父以师长身份长居施家，不清楚、暧昧昧，这其实是人性的胆怯与自私所致，与“情”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人格的焦点从完全被压迫的女性变为进退失据的男性时候，当论述的立场从无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变为有生产资料的有产者的时候，当主题的焦点从阶级压迫被转为“情”的呐喊的时候，作品移植的不足之处也就显露了——原本充满了战斗精神和批判锐气的锋芒，就在这样的焦点挪移中自挫了锋刃，殊为可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文艺新观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yxglmzg@163.com

白书人书事

阅读与行走于丽江的清纯时光

黄伟

我来往于丽江已有20多次。此次再游丽江，细细品味着丽江的变化。除了因为疫情原因，游人寥寥，结果是感觉古城更加干净和清静。

走在10年以前的街头，感觉到的手鼓声、吆喝声是一种喧嚣的躁动，走在每条街道听到的都是“就在我身边”……而今那些手鼓悄然换代，兴起了“换装摄影”，几乎在每一条街道，你都会偶尔会看见盛装的女子，摆好了姿势由摄影师们定格留下倩影。这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丽江悄悄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木府的灯光秀。我偶然在路旁看到一点灯光秀的结尾，虽然不够完美，依然感叹现代科技与传统王府的结合的尝试打开了一个新的审美空间。在感受古朴的历史文化的同时，世界需要发展，古城需要借鉴现代科技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个感受是古城的菊花展。当下的菊花展非常漂亮，但有点夸张，这并不是自然生长的原貌，朋友告诉我很快这些菊花就将撤下。好比一位美丽的女子，不用化妆或略施粉黛即可，偏偏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油彩。这油彩终有随着花开花谢淡去的时候，在那时，洗尽铅华的大石桥或许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记忆。

第四个值得一提的是“三联韬奋”书店。这个书店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过去记得这里是一个卫生所。书店的色彩用了一种与古城极不合群的浅蓝色，过于现代的设计，并不太适合周边氛围。丽江的书店，其实早已隐藏在各个客栈、各个咖啡馆那些看似散漫却不经意能翻出几本好书的书架上。

我看中的唯一一本书，依然还是《被遗忘的王国》，准备买一本送妹妹。准备付款的时候，店员告知，这几本《被遗忘的王国》都是非卖品，仅用于展示，原因是这本书已经缺货。

那么，三联书店的唯一好处，就是这里是一个容易定位的约会的地标，甚至有不用花钱的座位。

船长和丽江师专晓龄教授的约会，就定在三联书店。

在此之前，我和晓龄只见过一面，地点是在我最喜欢的云南三个地方之一的泸沽湖畔，而那次初相识，还不是在云南，而是在四川境内的“情人滩”一带。那一次，我去访问四川泸沽湖的导演戈巴海培，恰好遇上前去和同学讨论剧本的晓龄。

后来我和晓龄再没有见过面，但时有微信往来，都是相互欣赏对方的文字，经常互相发一些鼓励的话语。

这一次，我的时间安排比较充裕，就约了晓龄见个面。

我提前5分钟走进三联书店的时候，书店里有几个看书的女子的背影。因为5年不见，我确实无法判断里面有没有晓龄。于是就提着一袋准备和晓龄分享的随旅行带来的书，找了个桌子坐下来。

晓龄果然已经在书店里，同来的还有另一位师专老师。我建议她们一起去大石桥拉姆的咖啡屋坐坐。

一路上，晓龄介绍过去古老的丽江古城，哪里是密土巷，哪里有寺庙，哪里又是教堂。路过牛街老的小书店，晓龄停下来给牛夫人打招呼。然后问这里还有没有丽江的第一套风景明信片。那套明信片是晓龄题写的诗句，时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设计非常简朴。可借书店里已经找不到了。

拉姆刚刚开门，见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早上起来看到我写的文章，让儿子读给她听，听完泪都下来了。发到朋友圈后，收到很多鼓励的话，朋友们说：拉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晓龄老师的袋子究竟是什么书。

晓龄说：这是她的一位学生写得书，是关于飞虎队的。这位学生跑了好多个国家，采访过上百位二战时期的飞虎队队员或抗战老兵和他们的后人，此书出版于2015年，只印刷了1500册，学生送给我校10本。晓龄要了两本，自己一本，另一本书就是给我留的。她相信，总有一天，我和她会

在丽江会面，这本书就会找到自己的主人。

我接过书来，翻了一下，真的爱不释手。我是飞虎队文化的爱好者，足迹也遍布雷允、祥云、板桥，更不用说昆明，我读过很多飞虎队队员和家人出版的原版书籍。晓龄送的这本书，刚好是对我的飞虎队藏书的一个补充。

晓龄告诉我，作者一直在海外工作，如果需要可以加微信。我很开心，觉得终于找到飞虎队研究的同道了。

我也承诺要送晓龄一本书，那是去年校庆30周年纪念文集，我从未出过专辑，偶尔有一些书籍会收录我的文章，这本30周年纪念文集里面收录最多，共9篇。

接下来，是我秀书的时间。

我随身带着的书，有三类。第一是近期正在关注的话题，比如植物猎人；第二是管理类的书籍，希望不断提升管理能力；第三是随性的书，比如我去某个地方，一定会有一本与该地方有关的书。

我给晓龄介绍《玉龙雪山的植物》，晓龄也很喜欢看这本书。我还建议晓龄和妹妹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更多朋友。晓龄的妹妹是外学者，她曾和姐姐联手翻译并出版过《跟着大熊猫的足迹》，妹妹的英语能力和姐姐的中文炼字技巧让她成为翻译原版的绝佳搭档。

还有一本向晓龄推荐的书，就是我在沙溪小书店淘得的《领导力的信念》。我摘了书中的一些句子直接译给晓龄听，晓龄感觉很有共鸣，这本书是国庆节我在沙溪用20元淘得一本宝贝，我觉得她和作者阿尔贝特·莫勒尔之间有很多相通的思维方式和经验，而且都是作者归类的“阅读者”，可以轻易地找到与任何书的作者打开心灵沟通的通道。这样的书如果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读者，也还会是一种功德。

晓龄的同事说她们已经一年多没来古城了。我说，丽江古城是最适合读书写文章的地方，建议丽江人要经常来古城。

船长和丽江师专晓龄教授的约会，就定在三联书店。

在此之前，我和晓龄只见过一面，地点是在我最喜欢的云南三个地方之一的泸沽湖畔，而那次初相识，还不是在云南，而是在四川境内的“情人滩”一带。那一次，我去访问四川泸沽湖的导演戈巴海培，恰好遇上前去和同学讨论剧本的晓龄。

后来我和晓龄再没有见过面，但时有微信往来，都是相互欣赏对方的文字，经常互相发一些鼓励的话语。

这一次，我的时间安排比较充裕，就约了晓龄见个面。

我提前5分钟走进三联书店的时候，书店里有几个看书的女子的背影。因为5年不见，我确实无法判断里面有没有晓龄。于是就提着一袋准备和晓龄分享的随旅行带来的书，找了个桌子坐下来。

晓龄果然已经在书店里，同来的还有另一位师专老师。我建议她们一起去大石桥拉姆的咖啡屋坐坐。

一路上，晓龄介绍过去古老的丽江古城，哪里是密土巷，哪里有寺庙，哪里又是教堂。路过牛街老的小书店，晓龄停下来给牛夫人打招呼。然后问这里还有没有丽江的第一套风景明信片。那套明信片是晓龄题写的诗句，时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设计非常简朴。可借书店里已经找不到了。

拉姆刚刚开门，见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早上起来看到我写的文章，让儿子读给她听，听完泪都下来了。发到朋友圈后，收到很多鼓励的话，朋友们说：拉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晓龄全部读出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那一天晚饭，烤鱼有一些辣，我一边说：太辣了！一边用纸巾抹眼泪。只有我心里知道，这不是辣出的眼泪，是为了央金妹妹。看着不停地说话，不停地为两个哥哥夹菜的可爱的央金妹妹，我内心一阵酸楚。我知道，这是央金妹妹多少年以来，又一次找回了久违的和亲人一起吃饭的感觉……

白书人书事

《滇言说趣》出版



徐斌著《滇言说趣》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21年5月版）。这本书对云南方言（滇言）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联系历史、生活和风俗，让云南人对自己实际应用着的方言有了一种特别的认识。全书考据严谨，贴近日常生活，叙述风趣，颇值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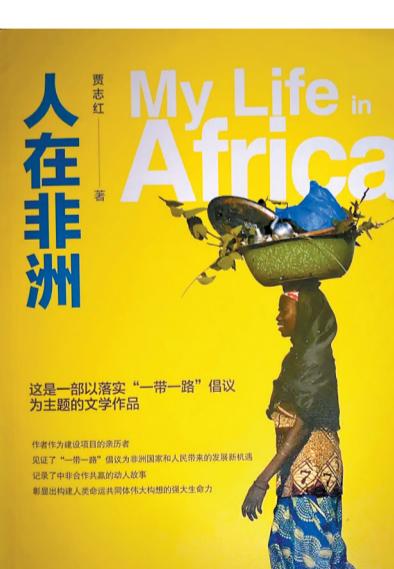
郑千山

品藻录

闪烁着人性光芒的异域采风实录

——读贾志红《人在非洲》

林琼



从非洲大城市锡加索一家名为“卓丽芭”的服装店，为卓丽芭捎回这条白裙，既是巧合，也是必然——服装店店名与卓丽芭的名字相同，是巧合，但作者看到适合卓丽芭的舞裙，便特意选购回来赠送给她，是必然。卓丽芭和非洲工人的热情感染了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工程队员，工程队员们以挖井、采石、施工、援建的务实之举，回馈非洲同胞的热情。在非洲、中国、世界各地，有许多同法杜娜类似的家庭，一家人虽不富裕，但却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简单、纯粹、自然，也是美好。法杜娜后来有幸到大城市锡加索的广告公司上班，希冀她像工地试验室的技术员雷拉一样，能够有幸与神奇的“蓝羽鸟”不期而遇，在它的引领和庇佑下，展翅飞翔向梦想的远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身材妖娆的非洲女性，身穿长衫，脚踩人字拖鞋，戴着头巾，用头顶打水的样子，竟然与我家30年前那款白底蓝花窗帘上印着的图案如出一辙。我方才知道，设计师当时设计的那款窗帘图案，并非天马行空，而是有据可查。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就是最好的诠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又专门百度了一番，才知道，作者笔下那些玫红色的九重葛，跟我们家乡的叶子花无异，希冀作者笔下的法杜娜、法蒂姆等非洲女孩，以及非洲大地上的人民，与恩古哈拉的九重葛一样，沐浴骄阳，茁壮生长，绚烂绽放。

《月光之舞》是全书最能让人顿生无限神思遐想的文章。一面跟随那些优美的文字，在杰纳纳的乳油树树林间、碎石场旁、工程队驻地的水井边徜徉；一面畅想美丽的厨娘卓丽芭，身着白色长裙，趁着月色翩然起舞的样子，心情既轻松又惬意。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我，很难想象就连通讯信号都没有的杰纳纳，该有多么寂寥、落后？但透过《月光之舞》，我能感知得到，稍作寂寥的状态和稍显落后的生存，丝毫影响不到那里的人们对待生活的热情。就像卓丽芭，可以在举着菜刀同工友们开玩笑的“厨娘”，与身着白裙在众目睽睽之下忘情起舞的“舞者”间，自由转换角色。作者

刚刚品读《翅膀》一文时，我味蕾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脱落了翅膀的油炸飞蚂蚁唤醒，可当读到阿美的家人想将16岁的阿美嫁给一个60多岁、已有三位妻子的男人时，一种不可言喻的失落情绪充斥进我的内心。我尊重非洲的婚俗习惯，亦理恤阿美家人让阿美嫁给与之年龄悬殊较大之人，是迫于还债的权宜之计，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我对他们的做法始终不以为然。庆幸的是，中非工友在关键时刻，向阿美伸出了援助之手，将她从那个腐朽的婚嫁牢笼中解救出来，能够更有尊严、从容自信地生活。飞蚂蚁的翅膀脱落，看似沉重的外表下，却是其完成了使命的超然。工友们的捐助，亦如飞蚂蚁的翅膀，在帮助阿美重获新生后，便不紧不慢、缓缓隐落，褪去苦楚，留下温暖。未来的日子里，希冀阿美张开充满爱与感动的“翅膀”，在蔚蓝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工程队员们在尼埃纳驻地的邻居小乌力，像一支利箭，一直在“奔跑，奔